

人口负担与人口红利的权衡

——论中国现阶段不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黄少安 孙涛^①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摘要] 中国近期有一种呼声：放松生育管制，主要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或“人口红利”丧失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也有极端观点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影响中华民族复兴和种族安全。我们研究后认为：主张“适度”放松管制，理论上成立，实际执行一定是远远“过度”，因为现在政策上没有放松，实际执行上就有很多违背政策超生的，人口普查的结果就是证明；威胁中华民族复兴和种族安全更是夸大事实。真正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定是中国巨大的人口负担，我们的许多努力都会被此抵消；人口老龄化是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一些压力，但是同时也是发展针对老龄人产业发展的机会，而且，相对于放松生育管制从而人口高速增长而言，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和负担是小的和短期的；中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人口负担大国，巨大的人口总量，对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子孙，都有巨大的负外部性，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想发展成为发达国家，首先经济结构必须升级，而经济结构升级又必须以生产要素结构升级为基础，必须提高技术和资本的比例，而不应该留恋于吃“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必须长期持续地坚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严格控制人口总量增长的前提下提高人口质量。

[关键词] 计划生育 老龄化 人口红利 要素结构升级 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 F062.2 F063.4

Erik Stokstad (2005) 在《自然》杂志中阐述人口问题时指出，维持世界的人口增长一直被无效资源的使用和贫困所威胁。他说，自然和社会科学以及技术方面必须要有有效的准备，来解决人类自身制造出来的问题（即人口急速增长和资源相对匮乏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可能是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然而，集聚所有政治意志去做出艰难的决定或许是一个更大的挑战^②。

对于经济史领域中考察马尔萨斯主义和人口发展进程的问题，华裔学者王国斌（2010[1997]）曾经对明清中国和同时期欧洲的人口历史进行对比研究，认为中、欧比较的

^① 作者简介：黄少安，1962年出生于湖南洞口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和农村经济，电子信箱：shaoanhuang@sdu.edu.cn；孙涛（通讯作者），1980年生于江苏金坛市，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电子信箱：tao_sun@sdu.edu.cn。

^② Stokstad, Erik, 2005, “Will Malthus Continue to Be Wrong”, *Science*, 309, July 1, p.102.

关键在于出生率与死亡率。在欧洲，人口规模的制约因素主要是出生率的降低，而非死亡率的升高。晚婚和部分妇女终生不婚所形成的预防性制衡（preventive checks），使出生率低于最大的生殖能力。与此相反，自马尔萨斯以来，研究者都为中国的高出生率担忧，认为只有高死亡率才能达到人口稳定——“积极性制衡”（positive checks）。虽然王国斌并不认同中国的积极性制衡（如食物供给不足、营养不良、战争所引起的高死亡率）是中国人口历史发展进程有别于欧洲的主要影响因素，但是，他论述到“中国与欧洲也同样有落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可能性，即人口压力会带来资源匮乏的经济危机。……斯密型动力所引起的欧亚经济的明显扩展，并未逃脱马尔萨斯主义的限制。”^①王国斌的理论逻辑中蕴含着不断恶化的人口——资源比始终是马尔萨斯主义危机的根源。

中国应对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人口急剧增长所采取的策略实际上就是上述的“预防性制衡”——计划生育。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不是全国“一刀切”，更不是西方部分学者妄言的“一胎化”政策，对于生育政策多样性^②的问题，国外学者的研究也有关注（Short and Zhai, 1998; Attane, 2002）^③。生育政策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都有所区别，一般来说，农村宽于城市，西部宽于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宽于汉族；生育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近些年，特别是在“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多数省份的生育政策在整体稳定的基础上作了适度微调，并且在生育间隔、再婚生育、独生子女结婚生育等方面明确了相关政策。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包括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人口问题及其效应，既是人口结构及其变化带来的，也是人口数量导致的。我国切忌由于现在面临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趋减等结构性变化，放松对人口绝对数量的基本控制，错误认识人口与发展的关系——包括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相互影响。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我国人口变化和整个社会经济变化的重大因素，甚至深远地影响世界未来的各个层面，作为一项重大公共政策，下一步的政策基调和取向如何，事关重大，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国情、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和发展观、对世界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反过来又如何影响中国。也许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重大因素就是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我们众多的努力可能很大程度上被巨大的人口负担所抵消。

^① 王国斌著、李伯重等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第二版。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把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条件交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因此，各地对于晚婚晚育、生育数量、生育时间间隔的具体规定存在较大差异。

^③ Short, Susan E. and Fengying Zhai, Looking Locally at China's One-child Policy,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29(4), 1998,373-387. Attane, Isabelle,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 Overview of Its Past and Future,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33(1), 2002,103-113.

一、近期部分有关放松人口控制的声音及其非理性

1、倡导适当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

一部分学者认为应适当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或提出一个渐进的改革路径，例如，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双轨制”，把某个时点（如199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女性作为“新人”，在某个时间节点（如“十二五”时期之初）规定除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者外，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桂世勋，2008）^①。周长洪（2005）则探讨现行生育政策微调的必要意义与可行性，强调推进单独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②。有些研究则更为细致地界区了两孩的生育间隔，Bongaarts and Greenhalgh（1985）通过数值模拟给出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可替代选择路径：如果（当时）每个中国妇女都在25岁生育一孩，而在间隔4年后生育二孩，则可以将2000年总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达到与一孩政策基本相同的人口数量控制效果^③。“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④中给出了一个为期15年的、“分类实施、逐步放开、两步到位”的调整方案，具体是：从2005年开始，允许单独夫妇的家庭可生育两个孩子。从2010年起允许所有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在实施中，为了避免短期内发生扎堆生育的现象，宜首先允许大龄已婚妇女生育第二个孩子，然后渐次降低年龄门槛，直至2020年实现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曾毅（2006）论证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的可能性，即提出渐进式的平均生育年龄逐步提高的二孩晚育是既可避免未来人口总数过大、又可避免老年人口比例过高的较佳生育政策选择^⑤。

在这类研究倾向中，有些研究还是比较温和和折衷的，例如郭志刚（2008）认为，目前中国存在多种降低生育率的因素（如出生漏报、性别偏好人工流产以及人口流动因素等），特别需要加以甄别和研究。如果忽略这些因素，结论就会有偏差，也就很容易陷入“看到低生育率的统计结果——归因于漏报并调高生育率估计——继续严格控制——再次得到低生育率统计结果”的糟糕循环之中。他认为以往谈及计划生育政策时大多先入为主地直接贴上控制和压低生育率的标签，而如今应该掌握好“度”，过犹不及，太高和太低都不合适，中国人口未来发展取决于这个“度”^⑥。

主张“适度放松”或结构性放松，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现实中执行起来，

^① 桂世勋，《关于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② 周长洪，《关于现行生育政策微调的思考——兼论“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人口与经济》2005年第2期。

^③ Bongaarts, John and Susan Greenhalgh, An Alternative to the One-child Policy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1(4),1985, 585-618.

^④ 参见《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收录于顾宝昌、李建新主编的《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论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⑤ 曾毅，《试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⑥ 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008年第4期。

我们能否掌握住“度”。我国多年来力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除开总量控制外，其实一直都有结构性松紧政策，而实际上还是有很多超生的，客观上已经是放松了的，因为中国太大，人们超生欲望太强，规避政策的手段丰富，政策很难被 100% 执行。如果我国现在在政策总基调上就确定为“适度放松”，执行起来可能会“过度放松”。

2、主张完全放开计划生育的研究

有些研究主张完全放开计划生育的政策，他们认为，中国人口政策到了彻底开放、鼓励生育的时候了，中国人不是生得太多了，而是生得太少了，中国人可以多生，也需要多生（梁建章、李建新，2012）^①。

不过，刘永平（2007）^②、刘永平和陆铭（2008）^③将代际交叠模型（OLG）应用于家庭养老问题的研究之中，构建了分析家庭生育、储蓄、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家庭养儿防老的传统下，如果没有生育政策的管制，那么家庭的内生生育数量会随着养育子女成本的上升而下降；同时它和家庭储蓄率、教育投资率也分别呈负相关关系。当前家庭生育需求受到抑制，生育政策的放开势必导致合意生育数量的增加，这将不利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积累。——这里忽视了中国文化因素对生育的影响，而且这种市场调节的思路忽视了“需要调节时间”和“付出巨大代价”，就像市场价格机制调节产品供求关系而造成产品或产能过剩及巨大浪费为代价一样。中国人口基数巨大，一年的放松都会是 1000 万级数的增长，中国根本承受不了这种“短期”高增长，即使是短期的高增长都是巨大的绝对数量，而且会构成长期的大负担。更何况多生出大量人口的影响远远不是多生产一些苹果等产品那样简单。Li、Zhang & Zhu（2007）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省级面板资料进行实证分析也发现，人口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当前，中国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至于以后什么时候放松，需要认真研究测算后再定^④。

综上，支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主要是认为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伴随着人口红利的丧失，以及劳动力的高负担率，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压力，人口的负增长是不能容忍和接受的。不过，这些认识有失偏颇，基本上还是流于“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的观念窠臼。我国现在离人口负增长甚至低增长还远得很。下文中，我们对此问题将予以论述。

二、中国人口的现状

^① 梁建章、李建新，《中国人太多了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② 刘永平，《完全放开生育管制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世界经济文汇》2007 年第 6 期。

^③ 刘永平、陆铭，《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8 年第 7 卷第 4 期。

^④ Li, Hongbin, J. Zhang and Y. Zhu, 2005, “The Effect of the One-Child Policy on Fertility in China: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2011 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 134735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644 万人，而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由 1978 年的 12‰降至 2011 年的 4.79‰^①。

大多数的研究表明，近些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 1.5 以下，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妇女生了不到 1.5 个小孩，低于更替生育水平。郭志刚等（2003）曾指出在提倡“少生”的总原则下，全国各省份从实际出发，生育政策呈现出多样化安排。他们测算全国总体的政策生育率^②为 1.465。顾宝昌（2002）也给出了 2000 年的总和生育率为 1.8^③，王丰等（2008）计算了 2006 年总和生育率为 1.38^④，而新近的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 1.18，其中城市为 0.88，镇为 1.15，乡村为 1.44^⑤。近十多年来不同统计口径和估算方法得到的结果基本都显著低于更替水平^⑥。

但是，“人口惯性增长”（查瑞传，1982；王丰等，2008）^⑦的存在，使人口增长积聚内在的能量。所谓“人口惯性增长”根源于人的生育周期和生命周期不同步，人的生育周期显然要比生命周期短得多。换句话说，各年龄组都可能发生死亡，老龄组别为主；而只有育龄妇女才能进行人口繁衍，新出生的人口居于年龄结构金字塔的底部。因而，历史的人口增长形成了特定类型的人口年龄结构。中国在计划生育政策初始阶段就是比较典型的成长型人口年龄结构，即每个年龄组的人口都比年龄更大的组要多（为正金字塔型），人口增长惯性趋势就会长期存在并将所积聚的势能不断释放。从女孩的出生到生育大概要经过二十多年时间，这就决定了至少在二十年内育龄妇女的人数仍然是越来越多的。即使她们平均生育不到两个孩子（或者说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育龄妇女的增加产生了基数效应，因此，总人口在相当长时期仍然还会维持稳定增长。表一中给出了近六年来我国育龄妇女的增加趋势。

目前，虽然我国的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之下，**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口低增长率与高增量将长期并存。**未来十几年，我国人口总量仍将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基本国情根本没有减缓，甚至有加剧趋势。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

^② 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人口研究》2003 年第 5 期。政策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完全按照政策的规定生育，平均每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

^③ 顾宝昌，《论中国计划生育的改革》，《人口研究》2002 年第 3 期。

^④ 王丰、郭志刚、茅倬彦，《21 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人口研究》，2008 年第 6 期。

^⑤ 《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国家统计局网站。

^⑥ 1992 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2.00，降到了更替水平（2.1）以下。其后至今，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再未突破该水平（谭克俭，2011）。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是 1.22，社会人口学者的估计是 1.47-2.3（丁金宏，2006），每个阶段，我国的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难以有定论，但是，这一比率在人口预测中又是极为重要的数值，采用不同的总和生育率分析所得的结论将有很大差异，政策建议差别也很大。谭克俭，《计划生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人口与发展》，2011 年第 2 期。丁金宏，《回归温和，温和回归》，《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 年第 1 期。

^⑦ 查瑞传，《人口惯性及其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影响》，《人口研究》，1982 年第 2 期。王丰、郭志刚、茅倬彦，《21 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人口研究》，2008 年第 6 期。

表一：近些年已婚育龄妇女人数、人口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和性别比情况。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已婚育龄妇女人数（亿人）	2.59	2.61	2.66	2.70	2.73	2.78
人口自然增长率（‰）	5.28	5.17	5.08	5.05	—	4.79
出生人口性别比	119.25	120.22	120.56	119.45	118.06	117.78
出生率（‰）	12.09	12.10	12.14	12.13	—	11.93
死亡率（‰）	6.81	6.93	7.06	7.08	—	7.14

根据 2006 年到 2011 年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以及《2011 年全国人口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公报》整理。

目前我国最大的国情是：一个发展的、人口数量超大、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经济总量虽然列于世界前列，但是人均量处于低水平，2012 年人均 5400 美元左右，居世界 87 位，如果考虑中国 GDP 的质量，我们的人均财富量更加排位靠后。尽管 2011 和 2012 年的数据表明中国已由“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①，但是，如何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仍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在人口发展战略方面加以应对——相对于人口数量的增加，需要更加倾向于关注在既有存量中对人力资源进行进一步开发和有效利用，不断提升国民素质。

自 1798 年马尔萨斯人口论提出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人口高速增长，学者和公众对此越来越担忧。埃利希（Ehrlich, 1968, 1971）^②认为世界人口（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迅速增长与过剩已经超过了地球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将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其中特别提出了“人口过多”、“食物不足”、“环境恶化”三阶段的人口危机过程。梅多斯等（1972）^③有关“经济增长极限论”的基调无疑是悲观的，他们认为当下的世界经济体系将诱变出人口和资本的指数式增长和崩溃，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当前的增长趋势持续下去，全球经济增长就会在随后 100 年内某个时点达到极限。最终的结果就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个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

埃利希夫妇（Ehrlich and Ehrlich, 1990）^④认为在面对严重的环境恶化问题时，人们完全没有理解（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快速的人口增长，控制人口增长在人类议程上的重

^① 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总收入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通常把世界各国分成四组，即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但具体的标准是随经济发展不断调整的。2008 年最新的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低于 975 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 976 至 3855 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 3856 美元至 11905 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 11906 美元为高收入国家。而 2010 年我国人均 GDP 约为 4277 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② Ehrlich, Paul, 1968/1971, *The Population Bomb*, 2nd edi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③ D.H.梅多斯等著，李涛、王志勇译，《增长的极限》，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年版。

^④ Ehrlich, Paul and Anne H. Ehrlich, 1990, *The Population Explos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要性仅次于避免核战争。人口过多并增长迅速与目前人类困境的许多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包括不可再生资源的迅速耗尽，环境恶化（如极端气候的频繁出现），以及逐渐增多的国际紧张局势。Mishan（米香，2011[1993]）也认为，即使第三世界国家在不久的将来发生经济奇迹，其生活水平变得与那些正在享受富裕生活的西方国家相一致，由于人口的增长也会致使不断增加的全球消费吞没那些还未开发的物质，然后再将这些工业和生活垃圾处理掉。这样一来，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就会被破坏。人口的密集、城市的拥堵、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消耗等，即便人均收入增加，人类的福利也许正在下降，这就是米香所认为的经济增长的代价^①。

对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环境承载能力与生育政策调整的关系问题，陈友华（2008）认为“不能仅仅看人口规模的绝对大小，同时更要看承载该人口的资源与环境，特别是土地资源的大小，也就是说更要看一些相对人口指标，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而应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指标就是人口密度。按照人口密度，中国略高于法国，低于甚至远低于意大利、德国、日本与印度。如果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角度考察，印度、日本、德国等比中国更有推行严格计划生育的理由”^②，事实上，考察承载人口的资源与环境相对指标是对的，但如果只是关注人口密度（有关土地资源的相对人口指标）则是有失片面甚至是错误的结论，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森林面积、人均粮食消费量、人均淡水拥有量（特别是一些与生活生产紧密相关的不可再生资源）等要比人口密度更好地刻画资源和环境对人口增长的约束，我国在这些相对指标方面无疑是很低的，诸如耕地红线、粮食安全、城市水荒等问题时而被提出。另外，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的差异，上述这些国家也不需要严格控制。

更重要的是人口总量的大小以及数量级（可以考虑 500 万以下为人口小国，500-5000 万为中等人口国，5000 万-1 亿为人口大国，1 亿-5 亿为人口特大国，5 亿以上为人口超级大国，10 亿以上为超级人口负担大国）。一些人口密度大但是总量不太大的国家，人口对本国和世界经济社会的影响，尤其对资源、环境和食物的影响，与人口超级大国比，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一个人口密度超大的人口小国缺粮食或者缺水与一个 10 亿以上的人口大国缺粮食或者水，对世界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也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三、老龄化带来的压力或负担重，还是多生人口带来的压力或负担重？

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近三十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产生了一个清晰的下降趋势，目前，基本上稳定在 5% 左右，从宏观层面上讲，缓解了人口膨胀的压力，为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了

^① E. J.米香著，任保平等译，《经济增长的代价》，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

^② 陈友华，《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若干问题》，《人口与发展》2008 年第 1 期。

有利条件。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官方公布资料^①表明估计在 2000 年，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累计少生 3.38 亿人，为社会节约抚养费 7.4 万亿元，节约物质技术装备费用 6.99 万亿元，使世界 60 亿人口日和中国 13 亿人口日推迟了 4 年。陶涛和杨凡（2011）^②的研究表明：在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我国 2008 年生育率水平的预测值大概在 2.5 左右。1972-2008 年间，排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单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中国少生了 4.58 亿人。

另外，对于未来中国人口的增长趋势，有些机构和研究学者也给出了基于当前不同生育率估计的人口预测，我们对一些代表性的研究做了梳理（见表二）。

表二：未来中国生育率和人口数量的预测性变化。

		2020	2030	2040	2050	2060	2070	2080	2090	2100	峰值
联合国人口 开发署 2007 预测（李建 新，2009） ^③	生育率（中）	1.83	1.85	1.85	1.85	—	—	—	—	—	14.58
	人口（中）	14.21	14.58	14.48	14.08	—	—	—	—	—	
	生育率（低）	1.33	1.35	1.35	1.35	—	—	—	—	—	13.65
	人口（低）	13.65	13.59	13.02	12.01	—	—	—	—	—	
曾毅（2006） ^④	现行不变	13.97	13.99	13.51	12.64	11.49	10.23	8.94	—	—	13.99
	二孩晚育	14.40	14.77	14.81	14.60	14.13	13.63	13.14	—	—	14.81
	二孩不变	14.60	15.08	15.26	15.14	14.78	14.38	13.95	—	—	15.26
乔晓春和任 强（2006） ^⑤	不变（高）	1.8	1.7	1.6	1.5	1.4	1.3	1.2	1.2	1.2	14.46
	调整（高）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14.93
	不变（中）	1.6	1.5	1.4	1.3	1.2	1.2	1.2	1.2	1.2	13.93
	调整（中）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14.34
	不变（低）	1.4	1.3	1.2	1.2	1.2	1.2	1.2	1.2	1.2	13.58

^① 《回首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1/Jul/43959.htm](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1/Jul/43959.htm).

^② 陶涛、杨凡，《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人口研究》2011 年第 1 期。

^③ 按照联合国人口开发署 2007 年出版《世界人口展望》的预测结果。中国生育水平假设中可能方案保持在 1.8 左右，低方案 1.35 左右，数据来源：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6 Revision) (李建新，2009)。李建新，《21 世纪大国的人口实力较量——人口学视角下的比较研究》，《南方论丛》2009 年第 3 期。

^④ “现行政策不变”是指维持计划生育政策现状，农村、城镇时期总和生育率由 2000 年的 1.9 与 1.15 略增至 2012 年的 1.98 与 1.2，然后保持不变所形成的人口增长路径。而二孩与晚育政策方案下，城镇生育率设定为 1.8，而农村设定为 2.27，再进一步分成两个政策方案：“二孩晚育软着陆”和“二孩与育龄不变”，两个方案生育子女数相同，但孩次生育年龄变动情况不同，在前者二孩晚育方案中，假定从 2012-2030 年的 18 年中，一二孩平均生育年龄分别共增加 0.9 岁与 1.8 岁，即平均每年一二孩生育年龄增加 0.05 岁与 0.1 岁（曾毅，2006）。曾毅，《试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 2 期。

^⑤ 如果假定我国 2000 年的总和生育率实际上有三种可能，分别是高可能（TFR=2.0），中可能（TFR=1.8），低可能（TFR=1.6）。每个方案（可能）又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为在人口政策保持不变情况下的生育率自然下降，直到下降到 1.2 为止，以后保持不变；另一种情况是到 2020 年以前是总和生育率自然下降，从 2020 年开始上调到 2.0，接近更替水平，并保持不变（乔晓春和任强，2006）。乔晓春、任强，《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 年第 3 期。

	调整（低）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14.20
--	-------	-----	-----	-----	-----	-----	-----	-----	-----	-----	-------

考虑一个没有资本、纳入自然资源和土地的 Solow 模型：

生产函数为， $Y(t) = R(t)^\alpha T^\beta [A(t)L(t)]^{1-\alpha-\beta}$ ， $\alpha > 0, \beta > 0, \alpha + \beta < 1$

其中， $R(t)$ 为自然资源（ $\dot{R}(t)/R(t) = -b < 0$ ）， T 为土地资源（ $\dot{T}(t) = 0$ ）。

人均产出或收入必须满足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即 $\frac{Y(t)}{L(t)} = \bar{y}$ 。

将生产函数表达代入生存条件，可得：

$$\frac{R(t)^\alpha T(t)^\beta [A(t)L(t)]^{1-\alpha-\beta}}{L(t)} = \bar{y}$$

整理得到：

$$L(t) = \left(\frac{1}{\bar{y}}\right)^{\frac{1}{\alpha+\beta}} A(t)^{\frac{1-\alpha-\beta}{\alpha+\beta}} R(t)^{\frac{\alpha}{\alpha+\beta}} T^{\frac{\beta}{\alpha+\beta}}$$

这一结论表明人口规模受约束于人均生存条件（与其反相关），与技术正相关，与土地和自然资源正相关。

进一步，对上式两边求对数后，在对时间求导数，得到：

$$\frac{\dot{L}(t)}{L(t)} = \frac{1-\alpha-\beta}{\alpha+\beta} \frac{\dot{A}(t)}{A(t)} + \frac{\alpha}{\alpha+\beta} \frac{\dot{R}(t)}{R(t)} = \frac{1-\alpha-\beta}{\alpha+\beta} g - \frac{\alpha}{\alpha+\beta} b$$

这一简单模型表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消耗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反相关，与技术进步率呈正相关关系。

根据人口增长的趋势数据和中国的环境资源数据（如耕地面积、林地面积、森林面积、水资源年供水量、湿地面积等）分析，由于人口基数大，绝大多数人均资源量在不同计划政策调整（基于不同生育率估计的人口峰值）情况下都接近于临界水平（见表三）。以耕地资源为例，人均耕地面积将紧逼下限，蔡运龙等（2002）^①预计 2020-2030 年人均耕地面积将会下降到 800 平方米（约 1.2 亩）。我们按照一些人口估计（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计算的这一数值也是在 1.2-1.3 亩之间。另外，如果还需要考虑人口增长带来的城市化、建设用地、交通设施用地等因素对耕地总量的占用，这一人均数值还要低。蔡运龙等（2002）认为从生产力水平、居民饮食结构等因素考虑，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限为 670 平方米（约 1 亩）。另外，还存在严重的地区结构失衡问题，2000 年左右全国已有 666 个县人均耕地低

^① 蔡运龙、傅泽强、戴尔阜，《区域最小人均耕地面积与耕地资源调控》，《地理学报》2002 年第 2 期。

于 530 平方米（少于 0.8 亩），其中有 463 个县低于 300 平方米（0.45 亩）^①。因此，以估算的人均耕地面积来看，中国人口——耕地资源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脆弱的，对人口增长的控制不容放松。

又如，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并不丰富，在越南和泰国等邻国，每年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为 3000-5000 立方米，而中国仅为 2000 立方米。此外，水资源的分布并不均衡；大部分的水资源集中在南方，而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北方。在中国长江以北地区，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每年 700 立方米，这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水资源的严重制约^②。

表三：中国资源环境的部分总量和基于人口预测的人均数据。

		耕地面积 (公顷)	林地面积 (公顷)	森林面积 (公顷)	水资源 (立方米)	年供水量 (立方米)	湿地面积 (公顷)
全国总量 ^③		12172 万	30590 万	19545 万	30906.4 亿	6022 亿	3848.55 万
预测人口峰值 的人均量 李建新（2009）	人口（中）	833.6 m ² 约 1.25 亩	2095.2m ²	1338.6 m ²	2116.9	412.47	263.6
	人口（低）	891.7 m ² 约 1.34 亩	2241 m ²	1431.9 m ²	2264.2	441.17	282.0
预测人口峰值 的人均量 曾毅（2006）	现行不变	866.3 m ² 约 1.30 亩	2177.2 m ²	1391.1 m ²	2199.7	428.61	273.9
	二孩晚育	821.8 m ² 约 1.23 亩	2212.5 m ²	1319.7 m ²	2086.9	406.62	259.9
	二孩不变	797.6 m ² 约 1.20 亩	2004.5 m ²	1280.8 m ²	2025.3	394.63	255.2
预测人口峰值 的人均量 乔晓春和任强 （2006）	不变（高）	841.7 m ² 约 1.26 亩	2115.4m ²	1351.7 m ²	2137.4	416.46	266.2
	调整（高）	815.2 m ² 约 1.22 亩	2048.8 m ²	1309.1 m ²	2070.1	403.35	257.8
	不变（中）	873.7 m ² 约 1.31 亩	2195.9 m ²	1403.1 m ²	2218.7	432.30	276.3
	调整（中）	848.8 m ² 约 1.27 亩	2133.1 m ²	1363.0 m ²	2155.3	419.94	268.4
	不变（低）	896.3 m ² 约 1.34 亩	2252.5 m ²	1439.2 m ²	2275.9	443.45	283.4
	调整（低）	857.1 m ² 约 1.29 亩	2154.2 m ²	1376.4 m ²	2176.5	424.08	271.0

^① 联合国粮农组织所确定的人均耕地警戒线为 0.795 亩（折 530 平方米）。

^② 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人均水资源低于 3000 立方米为轻度缺水，低于 2000 立方米为中度缺水，低于 1000 立方米为重度缺水，低于 500 立方米为极度缺水。

^③ 全国总量数据来源于 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注：其中耕地面积数据来自于国土资源部 2008 年底数据，林地和森林面积来自于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2004-2008）资料，湿地面积来自中国首次湿地调查（1995-2003）资料）。

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生育率的下降就意味着新生人口比例的减少，也同时意味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生育率下降得越快、越急剧，老年人口的比例也相应地上升得更快、更急剧。而死亡率的下降又使老年人寿命延长，促使人口老龄化程度更为加剧。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而其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2000 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我国 65 岁以上的人口已超过 7%，从世界经验来看，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1.78 亿，占总人口的 13.26%^①，社会养老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紧迫而繁重。

根据 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我们可以看到从大规模开展计划生育以来到 1990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大体在 15‰左右，从 1990 年到 1997 年，大致在 10‰左右，而从 1998 年之后到现在逐步降低到 5‰以下。如果以 2010 年末的全国大陆人口 134091 万为基数，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控制值 15‰、10‰、5‰来衡量。在未来的四十年的人口增长情况如表四。

表四 未来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值模拟增长情况（单位：万人）

人口自然增长率 控制值模拟增长	2020	2030	2040	2050
15‰	155618	180601	209595	243244
10‰	148120	163617	180734	199643
5‰	140948	148157	155733	163698

以自然增长率为 5‰、10‰、15‰趋势所获得的 2020 年、2030 年的人口总量数据，计算人均资源数量，如表五：

		耕地面积 (公顷)	林地面积 (公顷)	森林面积 (公顷)	水资源 (立方米)	年供水量 (立方米)	湿地面积 (公顷)
全国总量 ^②		12172 万	30590 万	19545 万	30906.4 亿	6022 亿	3848.55 万
5‰	140948 万人 (2020 年)	863.58m ² 约 1.30 亩	2170.3 m ²	1386.7 m ²	2192.8	427.25	273.05
	148157 万人 (2030 年)	821.56 m ² 约 1.23 亩	2064.7 m ²	1319.2 m ²	2086.1	406.46	259.76
10‰	148120 万人 (2020 年)	821.77m ² 约 1.23 亩	2065.2 m ²	1319.5 m ²	2086.6	406.56	259.83
	163617 万人 (2030 年)	744.05 m ² 约 1.12 亩	1869.6 m ²	1194.6 m ²	1888.9	368.05	235.22
15‰	155618 万人 (2020 年)	782.17m ² 约 1.17 亩	1965.7 m ²	1256.0 m ²	1986.0	386.97	247.31
	180601 万人	673.97m ²	1693.8 m ²	1082.2 m ²	1711.3	333.44	213.10

^① 《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国家统计局网站。

^② 数据来源同前。

	(2030 年)	约 1.01 亩					
--	----------	----------	--	--	--	--	--

根据表五，即便是维持当前的人口增长率 5%左右，在 2030 年人均资源状况也趋近于最低水平线，更何况如果放松至 10%或 15%，人口数量将爆发性增长，人均资源状况将更加严峻。

对于人口老龄化将会带来的影响，比较多的讨论集中在“养老”的问题上。中国的传统是“养儿防老”，也就是上代人到了老年时要依靠下代人养老。但生育率的急剧下降，使家庭的子女数量急剧减少，而长期以来医疗保障制度和退休养老制度对城市人口适用。一部分农村老年人面临着既不能依靠国家养老，又难以依靠子女养老的两难境地。而随着人口流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离开农村走向城市。这就出现了所谓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但这更多是情感支持而非资金因素）。

在 Mishan 看来，“即使在西方社会，养育孩子也变成了一种净支出而不是净收益——奢侈而不是一种经济保险形式。”（米香，2011[1993]，p.81-82）这一看法正好也与我国对超生征收费用由“超生罚款”改为“计划外生育费”，再改为“社会抚养费”的思路一致。即生育行为有其社会性，会产生外部影响，超过限度就会使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现在，特别是农村地区，养儿防老的思想还是很重。在生育行为决策中不去算长期账和社会账，这种观念的演变还需要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配合跟进。

值得关注的是，“老龄化”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发展机遇，涉老服务业首当其冲将有一个巨大的增长，举例来看，2009 年，在北京市民政局等职能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意见》中，北京市政府确定了 2020 年“9064”养老发展目标，即到 2020 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另外，根据国务院公布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规划（2011-2015 年）》中建设目标显示，到 2015 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制度完善、组织健全、规模适度、运营良好、服务优良、监管到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将达到 30 张，这直接新增养老服务就业岗位 500 万个。

因此，养老、护理等社会化服务产业实际上有极大的发展机遇和就业空间，从而也为第三产业的发展 and 整个三大产业的结构升级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也有些研究者从人口密度数据方面寻找支撑放松甚至放开计划生育的论据，认为有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香港等）人口密度很高，但是经济发展水平也很高。不过这种认识根本没有注意到：高人口密度的人口小国与高人口密度的人口大国或人口密度

不高的人口大国，对资源的需求量和对世界资源供求关系和其它方面的影响（例如粮食和水等）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更何况中国国土面积中不适合或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的土地较多，生态环境脆弱，单位土地面积可承载的人口量有限。

另外，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过程，必然要经历老龄化，如果说，现在的老龄化是造成一代人或两代人的压力，是相对短期的，而如果现在就放松或放开人口生育政策的代价却是恶化多代人的生存环境和资源条件，并且，这一进程极有可能是以一个更为严重的老龄化局面终结。而且，由于历史、观念、政策执行等方面的问题，如果稍微对人口政策有所松动调整，那么，实际的效果可能是放松好多倍，使人口数量潜在地增长很多。

四、要素结构升级与计划生育政策的理性选择

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发展成为发达国家，取决于能否实现经济结构升级，而经济结构能否升级，取决于能否实现生产要素结构升级，提高资本和技术在要素结构中的比重。如果不能实现要素结构升级，长期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和劳动力消耗及长期靠吃资源红利和人口红利，一是不可能持续，二是不可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获取资本和技术红利，也就只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获得一定发展后，还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享有人口红利^①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从理论和实践上说，一直维持较高的人口红利是不可能的（如果一直要求人口的较高的低龄化必然要求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后果的严重性不可想象）。前一个阶段的高人口红利必然意味着后一个阶段的人口“负债”。在这一过程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必定需要伴随着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战略的整体调整。一个严肃的问题在于，中国是否应该和能够继续留恋于人口红利？是否应该和能够继续依靠低廉劳动力吸引外资、保持产品出口竞争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非常直白：更为理性的选择应该是适时进行要素结构升级、由主要吃人口红利转向主要吃资本红利和技术红利。现在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对于中国来说有两种选择：一是按照一部分专家的意见，放松或放开计划生育，寄希望与继续吃人口红利，中国继续做发展中国家；另一种选择是，把老龄化当成对中国要素结构升级的良性倒逼机制，提高要素结构中的资本和技术比例。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成功的经济体^②共同特点之一就是，他们都是开放经济，并在技术创新、产业

^①人口红利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经济体的经济呈现储蓄水平高、投资亢奋、劳动力资源丰沛和经济高速增长的状态。可以表现为如下的过程：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时期。所以说，人口红利主要是从人口数量和人口年龄结构角度论述的。而完全不考虑人口质量和人力资本因素的人口红利概念是否准确本身值得商榷。

^② 从二战以后，全世界总共有 13 个经济体，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达到 7% 或更高，而且持续了 25 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参见：林毅夫，“中国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周刊》2012 年第 43 期。

升级时利用世界上既有的知识进行产业和技术创新。从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 2012)^①的角度来讲, 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如果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 这个国家的经济要快速发展, 必须改变要素禀赋结构, 也就是要增加劳动力可用资本的拥有量。这一资本可以是物质资本、也可以是人力资本, 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越快, 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升级的速度也越快。

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战略整体调整的核心在于提升单位劳动力的质量。正如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在其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人口发展战略应该“坚持以人为本, 推进体制创新, 优先投资人的全面发展: 稳定低生育水平, 提高人口素质, 改善人口结构, 引导人口合理分布, 保障人口安全; 实现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 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我国的实际情况是: 现在已经是一个人口负担大国, 要避免继续和长期维持人口负担大国, 甚至成为人口负担越来越重的大国。**

我们研究权衡后的结论是明确的: 中国在现阶段以及今后较长时期, 理性的选择是, 人口政策的基调仍然是继续坚持严格的计划生育管制。当然, 计划生育政策不能是单一的政策, 而应该围绕计划生育政策构建一揽子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计划, 缓解和消除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带来的风险和负面影响。

1, 缓解人口红利不足和劳动力资源的问题, 可实行更为弹性的退休制度, 适度延长退休年龄。从人民网调查的数据来看, 尽管大多数人都反对延迟退休, 但退休年龄是否延长, 是和很多社会因素相关的复杂问题。就劳动者本身而言, 包括工作岗位的提供、劳动者的身体状况、工龄等因素都需要统筹考虑。同时, 又与国家的就业政策、劳动力供给、养老金的收支等因素相关。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来看, 从应对老龄化的角度上讲, 延迟退休年龄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和方向。

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 男职工年满 60 周岁, 女干部年满 55 周岁, 女工人年满 50 周岁。不过, 在制定该政策时, 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只有 50 岁左右。而目前平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 73.5 岁左右, 应该说也为退休年龄制度的微调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退休制度的调整可以优化劳动人口和非劳动人口的比例, 增加既有人口存量条件下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口红利的释放。当然, 对于退休制度也要也应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差别化和多样化的弹性安排, 切忌“一刀切”。

2, 通过多种方式的教育和培训, 提升劳动力存量的人力资本, 从而部分冲抵由于人口年龄结构改变可能导致的人口红利的减少。人口学家有时也将“人口红利”称为“人口机

^①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 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会窗口” (Demographic Window of Opportunity)。这一机会窗口是指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快于抚养人口的增长速度，这就可能激发消费水平提高、人力资本或物质资本积累增加等，从而导致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不过，这样的人口结构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导向更快的经济增长，它只是为人口红利产生创造了潜在的条件，真正实现经济发展，需要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还需要相配套的资本、资源、环境等条件。所以，前面所述脆弱的人口—资源比也会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此外，通过对现有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更高效的经济增长。

3, 充分考虑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带来的社会养老保障问题, 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

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已经持续三十多年时间，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减少了人口爆炸的风险。但是，客观的讲，也使一些家庭增大了生活的风险，比如失独家庭正是如此，这样的家庭同时存在中几个方面的问题，养老、精神疾患、返贫等等。据卫生部发布数据显示，在中国，至少有一百万个这样的失独家庭^①。

对于已经出现的“失独家庭”，各级政府必须承担起计划生育补偿的国家责任，大力推进奖励扶助制度，改变群众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和养老传统，促进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巩固，解除计划生育家庭面临的各种现实困境。

2004 年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实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辅助制度，对农村年满 60 周岁、现存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夫妇，由国家财政发给每人每年不低于 50 元的奖励扶助金，2006 年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2008 年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全面实施，该制度对城乡独生子女死亡或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女方年满 49 周岁的夫妻，每人每月分别给予不低于 100 元或 80 元的特别扶助金^②。周美林和张玉枝（2011^③）认为特别扶助制度也存在一些缺陷，如一些重大疾病的独生子女父母尚不能纳入特别扶助制度；落实的及时率还比较低。因此，在探索建立特别扶助制度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及时提高特别扶助金标准的同时，需进一步完善特别辅助制度。

4, 在考虑生育率的更替水平时, 要注意到女孩的生育率, 就要在相关制度管理中加以严格。比如, 严格禁止非医学目的的性别筛查和选择性堕胎。

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在大多数省份的农村如果第一胎是女孩的话，可以生育第二胎，由此可能引发生育政策的性别歧视问题，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只有

^① 资料来源：2012 年 7 月 15 日央视新闻频道《新闻周刊》。

^② 全国各个省份除了“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农业人口）”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城乡居民）”两项基本一致，也有其他不同的、多样化奖励辅助安排。具体参见洪娜和桂世勋（2011）的表一。洪娜、桂世勋，《统筹计划生育补偿机制与导向机制的新思考》，《人口与经济》2011 年第 1 期。

^③ 周美林、张玉枝，《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人口研究》2011 年第 3 期。

一个女孩的家庭可以生育二胎的政策导向会进一步诱导出性别选择现象。不可否认，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我国特别是农村地区仍然存在“重男轻女”性别偏好的思想，造成实际生育中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形成了更高的更替水平，拉大了实际生育率和更替水平的差距。另外，非医学目的性别筛查和选择性堕胎会对人口性别结构造成损害，拉高出生性别比，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相背离。

5，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应对老龄化的局面，以及提升国民素质和公民意识，而不是纠葛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

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体量巨大，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也不可否认，另外一个方面，相对弱化了紧紧围绕着人本身的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社会关注和公共服务资源投入。

根据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我国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主要由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等三个部分组成。在“十二五”期间，目标是基本建立起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在这一服务体系的基本构建还需要政府的资源投入和政策引导。

我们在上文的论述中，已经提到人口更替水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与预期寿命反向变动，与随着性别比同向变动，例如，其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而降低，随着性别比的降低而降低。如果做好了养老、医疗、社会保障方面的工作无疑会提高国民的平均预期寿命，而更为严格的反对非医学目的的性别人为选择则会降低性别比，这些都能降低现实的更替水平，从而使现实的总和生育率更为接近更替水平，有助于人口再生产结构的稳定。

6，使我们的国民认识到：继续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是中国和平发展、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和有限的资源，可以说是中国许多矛盾的终极原因。因为资源的严重短缺，人们就会为生存和发展展开激烈竞争，人就会变得越来越精于算计，越来越不可爱，越来越相互不信任，从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就难以很和谐，动物生存竞争的规律必然起作用，社会矛盾的增加和激化根源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到了一定限度后，政策、法制和技术都会失灵。

我们必须把中国巨大的人口问题置于开放条件下考虑。中国众多人口对世界食物及其价格的影响、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对世界资源和环境的影响以及反过来世界对中国的制约的可能性、对中国的友善程度及其可持续性，都是我们必须考虑到的。设想一下：中国对外移民的趋势不减、规模不断扩大，中国进口粮食的规模继续扩大，中国进口石油、木材、铁

矿等的规模继续扩大，对世界的影响将是什么？世界对中国将会怎样？实行计划生育、稳定人口数量有助于减轻周边国家对我国“人口扩张”的担忧。

五、结语

看似孤立的家庭生育行为决策，实际上会牵涉到诸多社会公共领域：如教育、公共健康、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方面以及整个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公共地悲剧”的逻辑在家庭生育决策及其社会后果中也存在着。如果推崇无限度的自由，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追求自身最佳的目标，却可能会给所有人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如果将生育自由和天赋人权生硬地联系起来，就很有可能把整个人类社会带入“公共地”的悲剧之中。不能简单地顺应民众呼声，要充分认识公地悲剧效应和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原理。要多生孩子可能是现阶段众多民众的呼声或愿望，但是并非民生问题，生出孩子以后怎样养活、养好才是民生问题。因此控制人口总量和优化人口结构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投票方式决定的问题，必须是社会精英着眼全局、长远，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从顶层设计和强制实施的重大国策。

Abstract: Recently there is a voice—relaxing birth control, mainly based on the aging of our population or loss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thus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also there is an extreme view that China's family planning negatively affects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race safety. We consider the idea of "moderate" relaxing control is theoretically plausible, but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is far from "excessive" point, because now the policy will not relax, there are lots of violating behaviors having th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The census results is proved—the threat of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race safety is exaggerated. The real obstacles to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China's huge population, many of our development efforts will be the cancellation. The population aging will not only bring some pressure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for the elderly industry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omparing with relaxing the birth control and high population growth, aging brings the pressure and burden is small and short. China as the world's sole super power country with population burden, to the world and our own children, the total population are hug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It could be harmful to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become a developed country, China as a developing one must first upgrade economic structure. The upgrade of economic structure must improve the technology and capital ratio taking the upgrading of the production factors structure as the foundation. We should not love to enjoy "population dividend" and "the resource bonus". Our conclusion is that China must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strict family planning policy for a long tim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premise of strictly controlling the population growth.

Key words: Family planning, Aging of population, Demographic dividend, Upgrading of the production factors structure, Social security